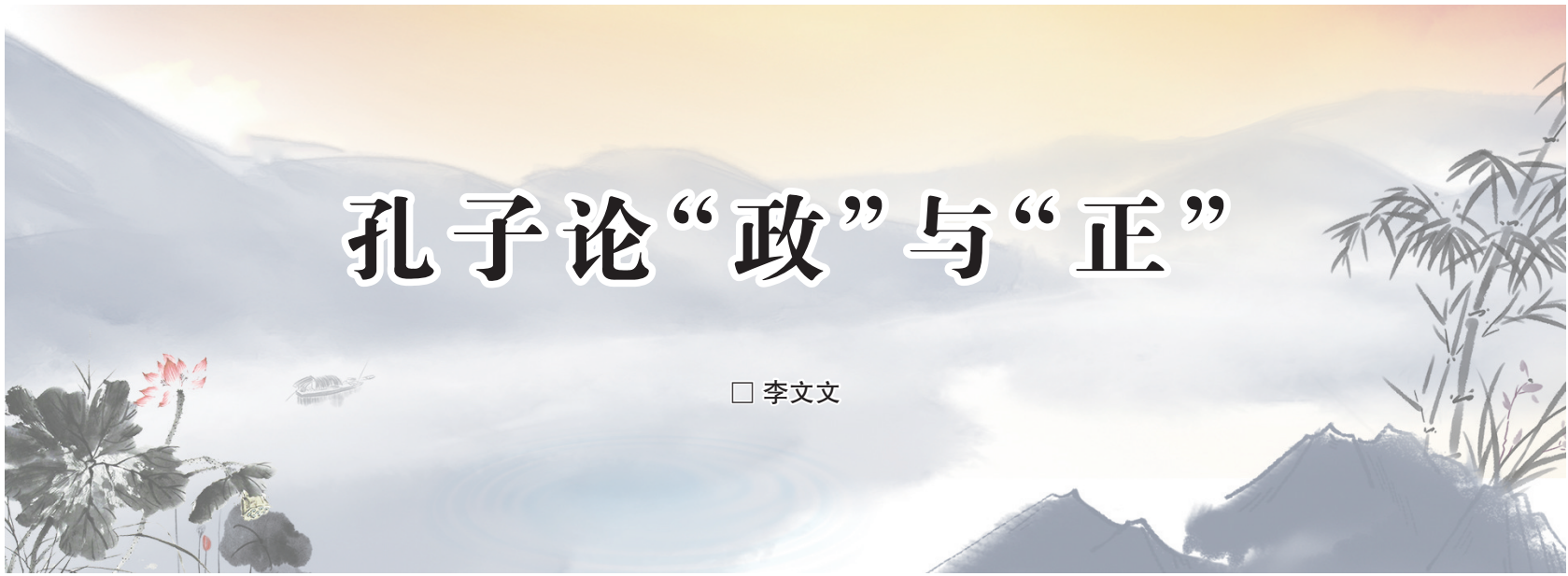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□ 李文文

孔子论“政”与“正”

孔子劳心于政治，这源于儒学的根本关切。孔子思想中没有“两个世界”（今生、来世）的说法，他信奉现实现世的生活世界。在孔子看来，老年人安享晚年，朋友间信任交往，年轻人怀抱理想，化行俗美，民生和乐，这是理想世界应该有的模样。让天下成为对人类而言更美好的所在，参与政治就比其他一些事务更紧急、更有必要。唯有建构有序、和平、稳定的政治体系，才可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，为百姓的幸福安康提供最直接、最根本、最长期的保障。

为政的本质在“为正”

《学而》作为《论语》首篇，由“学”境打开入道之门。行走在通往理想之境的大道上，要做人、要做事，这就是广义的“为政”了。然而，做人做事需要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，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点，在纷杂的社会治理体系中，聚光灯将会敏锐地映照于社会的决策系统、管理系统，即人们通常情况下所理解的“政治”，孔子所论述的“为政”一般情况下也就是这个层面而言的。《为政》篇紧随《学而》之后，这一编排，足以见得政治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。

孔子论述政治，重点不在于进行政治概念的界定和探讨，他采取了启发式的言说形式，引导从政者投身于政治的现场，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政治的本质。孔子常常将政治与“正”并举。例如，《论语·颜渊》中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《论语·子路》中，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，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
孔子深刻认识到物质基础、军事力量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，同时，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更本质的力量对

秩序带来的更加深层的影响，那就是人心与人性。如果政治不能起到引导人心、治人之情、化民成俗的作用，将背离它最本质的使命。

在 social 秩序建构的过程中，政治往往面临复杂的价值抉择。这种抉择反映着为政者的智识，也将带来不同的治理结局。政治关乎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利益之间作出抉择，如果无法有效而协调地将这些选择付诸实践，人们便会处在战争状态之下，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这种战争的存在是普遍的，甚至涉及每个人，关乎时时刻刻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，“强者胁弱，众者暴寡，知者诈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养，老幼孤独不得其所”，即是对此种“战争”及其恶果的形象描述。正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理性认识，孔子重视维护权力的公信力。而为了保有力量的公信力，他们将引导、教化人心之正视为权力的天职，达成政治的真正威力。

为政者贵在“帅以正”

在政治体系中，理想的为政者或权威具有重要作用，这在诸多学派中具有共识，孔子对于他们的作用模式有自己的看法。

孔子谈“无为而治”，曰：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就在这一章，孔子不仅谈舜之“无为”，还论他“何为”的问题，以此将“无为而治”与“恭己正南面”形成了一个串联结构。因为有了恭身修己、以正君位这样强力有为前提，才有了无为而治的结果。孔子认为，理想为政者的作用模式，在于正身修己，成为典范，随之而来的是，百姓们争相仿效，天下趋之若鹜。这其中蕴含着孔子政治学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底层逻辑，即权力的行使在于权威发挥作用，而权威作用的发挥深深扎根于行使权力者本人的典范行为。当为政者的典范行为直

观地呈现时，示范作用就相应而生了，即被影响者通过观察，产生联想，得到启发，进而复制或模仿，诞生了自己的行为范式。孔子将这种具有高度作用力的典范行为凝练为一个字——正。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孔子论“正”，并非经由抽象的思辨，而是将它落实到“正身”，表现为威仪动静。修身之要就是为政之本，自身的素养，就是从政者最大的资本。

在孔子看来，比起使用威胁的手段迫使他人服从，激活人内在的自觉，进而主动跟从的方式要高级得多。应了一句话：一个人是什么，比他灌输了什么，影响更为深远。

建构“天下”之“正”

在西方传统中，或大或小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斗、冲突中相接，最直接的问题是：你为谁而战？何人得益？他们将角逐与分配视作核心问题。孔子却不这么看，他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思考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维度：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？政治的对象是“天下”。“天下有道”“天下治”应该具有何等模样？应该如何建构“天下”之“正”？

解决这个问题时，孔子的学说常将“家”“国”与“天下”并谈。“家”指卿大夫之家，“国”指诸侯之国，“天下”指溥（普）天之下。这一组概念皆有统治范围的义涵。中国古人视普天之下都是中国的疆域，这貌似和他们有限的地理知识和想象有关，其实并不尽然。必须要注意的是，儒家所论“天下”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概念完全不同，在更多的情况下，它并不特指某一固定的统治区域，没有某个确定的地理空间，往往是对统治权的泛指、虚指。而一统的文明正是“天下”这一“虚指”最实在的支撑。那么，这种文明最大的特

起风腐腐一体治理、惩政治一体贯通的长效运行体系，形成攥指成拳、指硬拳更硬的整合力。

一严到底的革命锻造

我军素来被称为“大熔炉”“大学校”，善于通过革命锻造实现根本性的重构重塑。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，毛泽东突破部队中存在的旧思想、旧习惯、旧制度，明确红军的性质、宗旨和任务，从根子上解决了红军“为谁当兵、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”的问题。延安整风运动通过自我革命式的锻造洗礼，确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，创立了“党的建设”新模式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“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”，党的形态、气质和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
2014年，习主席带领我们重回古田，正本清源铸军魂，归正重心强军队，全面从严肃军威，对人民军队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革命锻造。经过新时代强力整肃整改，人民军队一路攻坚克难、除弊开新，又到了“风卷红旗过大关”的历史隘口，到了“一山放出一山拦”的时代关头，习主席英明决断带领我们重回延安检视初心、淬火加钢，鲜明提出政治建军时代要求，体系部署6个方面重点工作，就是要深入推进政治建军，加强革命性锻造，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。

从古田到延安，人民军队如同被反复淬火锻造的钢铁，杂质被不断去除，信念变得更加坚定。加强革命性锻造，是党领导人民军队浴

点是什么？这也是“天下”观念最核心的要义，这一要义呈现在“天与天下”的语言结构中。

在“天与天下”的语言结构中，“天下”观念最原初、最本质的寓意得以彰显，蕴含着古代中国人对“天”之“下”之存在方式的思索。无论孔子说“天下有道”，抑或“天下无道”，都是以“天道”为坐标，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论述。儒家文化所理解的人类理想文明图景的型构，正锚定在天地之间，与天道相应相辅相成是“天下”这一文明观的标识。孔子极力描绘“天下有道”的理想社会，这些话无一不以天、天道作为参照坐标，孜孜以求天与天下的良性互动。

中国传统社会视政治的对象是“天下”，上应天道，下涉天下之民、世界秩序建构，即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。也就是说，政治为天下之公器，理应为天下人谋福祉，不为某部分人所专有。孔子之所以称颂西周初年的政治盛举，在于它实现了“天下之民归心”的目标。

孔子侍坐于哀公，哀公曰：“敢问人道谁为大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之及此言也，百姓之德也！固臣敢无辞而对？人道，政为大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谓为政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君为正，则百姓从政矣。”好的政治理应赢得民心。孔子视“正”为政治的本质属性。相应而言，从政者自身正、引导正、树立正，则是孔子提出的实现秩序与文明的方案。这一思维使得孔子的政治哲学具有整全视野，它向上、向外拓展，超越民族国家，也向下、向内渗透，进入个体自我。



火重生实现伟大变革的重要法宝，也是奋进强军伟业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实践要求。

淬火锻造聚焦的是政治上更加纯粹，把赓续红色血脉突出出来。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经常性、成体系组织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军史学习教育，常态化开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“战地课堂”“流动课堂”“随机课堂”，探索走开红色教育理论灌输、历史寻根、情景浸染、現地感悟路子，切实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，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纯洁光荣。

淬火锻造聚焦的是党性上更加坚强，把加强斗争锤炼突出出来。着力强化党内政治生活熔炉功能，积极探索案例式、体验式、情景式方法抓好经常性党性党风党纪教育，历练广大党员干部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本领，切实用“硬度实度紧度”对冲“软化虚化弱化”，不断增强党性锻炼的烈度纯度，在点滴养成、久久为功中强化党性修养。

淬火锻造聚焦的是生态上更加纯净，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突出出来。全面加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，抓住定政策、作决策、搞审批等关键环节，进一步检修加固治官治权法规制度，为权力运行涂上“防腐剂”、戴上“紧箍”。特别要防范“专业特殊论”“技术优先论”掩护下的私欲贪念，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，健全决策审批、监督监管、检查验收、军地对接等制度，以法治刚性约束思维惯性、压缩落弹性、匡正行为任性。

（作者单位：武警内蒙古总队）

中医何以曰“中”？人们多以为：因为中医是中国的医学，与西医相对，故曰中医。其实不然。中医之“中”，有其独特含义，且意蕴颇深；不夸张地讲，弄懂“中”之内涵，既能明了中医之精髓，也能因此领悟中国哲学之要义。

溯源历史，中、医连用，主要有两个重要来源：一为《黄帝内经》的“上医治国，中医治人，下医治病”之言；一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“有病不治，常得中医”之论。第一个“中医”实从医者的层次或境界上进行分判：上焉者治国，下焉者治病，中间者治“人”，故曰“中”医（取“中间”之义）；第二个“有病不治，常得中医”之“中”，须重读，言以“中”医人。即是说，“中”为原则，一切治疗手段须围绕“中”进行。余以为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之“中”当谓中医之正解。

“中”乃生命诞生的前提条件

按中国古哲看法，气为生命之始，庄子谓“气聚则生，气散则死”；《素问》言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”；等等。然“气何以能聚”，是需要前提条件的，此条件即是“中”（中和）。古人认为，气分阴阳，然“孤阴不长，独阳不生”，唯有阴阳调和，达至老子所谓“负阴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的“中和”之状，生命方可发生；《中庸》言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即言此理。倘若阴阳阻隔或阴阳失衡，将导致天地失位、灾难丛生，又何谈生命之诞生。依古哲，唯有阴阳和合，万物方能产生，《国语》谓“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”，即言“中和”乃生命诞生之源。

“中”为生命正常运行之基本保障

生命生于“中”，亦成于“中”，此可作三层理解。首先，肌体（生理）若健康，须持其“中”。躯体若健康须保持阴阳、动静之平衡；倘若阴阳失衡则将引起病态，正如《内经》所言，“阴胜则阳病，阳胜则阴病。阳胜则热，阴胜则寒。寒伤性，热伤气”；《内经》又曰：“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，是谓五劳所伤。”故欲求身体健康者，须饮食有节、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以此保持阴阳动态平衡的“中和”之态。其次，情志（心理）若健康，须持“中”。概情绪偏执或过度，皆可能引起疾病，现代医学表明，人的疾病百分之七十由情志引发。《内经》谓七情过度伤五脏，所谓“怒伤肝、恐伤肾、悲伤肺、思伤脾、喜伤心”；《内经·举痛论》复言“百病生于气也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……思则气结”，极言情绪对健康之影响。五脏之中，心最重要；《素问》言“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”；《灵枢·本神篇》谓“所以任物者谓之心”，此言，心为主宰，亦主七情；七情不和则百病生。故古人尤重养心，周敦颐言“人，贵在养心也”，并作《养心亭记》；书法家米芾诗云“病觉养心功”，亦重养心。养心之旨贵在平和，应常知足以安心、“喜怒”以平心，尽量将“心”调整至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的“中和”状态。最后，处世的“全生”之道，亦贵在“持中”。孔子曰“勿意、勿必、勿固、勿我”，要人持中庸之姿；老子言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”（中道）；《尚书》的十六字箴言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，亦重“中”；道教人士张三丰言“夫道，中而已矣”，更是现身说法。其实，人世间的争端乃至战争，多源于违背“中庸”之道，故引来是非、烦恼乃至杀身之祸。故而，处世之“中”，与“全生”之关系大矣！从消极维度言，中庸之道乃远离是非、远离烦恼，获得生命安全的生存之则；从积极维度言，“中庸”亦是获取生命意义、提升生命境界的核心要旨，甚至是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。

“中”为传统医学“治疗”之基本理念

以传统医学维度观之，疾病之所生，根蒂上在于阴阳失衡而偏离“中”；故而，中医之治，重在调和阴阳纠其“偏”，使之重返“中”。《伤寒论》言“阴阳自和者，必自愈”，即表明此意。“和”乃病愈之道，自和者，即通过自我调整，回归阴阳平衡的状态，以达到“自愈”；



若不能“自和”，则须靠医生进行调整。换言之，“阴阳平衡”、阴阳中和，既是中医的健康观，同时也是中医的治疗观。鉴于此，中医治病，须先辨阴阳。阴阳者，《素问》解释为“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，治病必求于本”。辨别阴阳亦非易事，为此古人围绕阴阳、五行、经络等构建出一套系统的理论，并结合虚实、表里之征象发展出望、闻、问、切的“辨证”之法，以寻找导致阴阳失衡的原因。在此基础上，运用特定之手段（按摩、针灸、汤药）纠正其偏，使之重返身体的“中和”状态，从而帮助恢复健康。

古人甚至发明出以音乐调节情志的“辅助治疗方案”，具体说来，即是以五音配五脏、调五情，使其情志重返“中和”之态。譬如《梅花三弄》养肾，《紫竹调》养脾，《阳春白雪》养肺，《十面埋伏》养脾……理由在于《梅花三弄》五音为羽，属水，肾属水，故养肾；《十面埋伏》五音为宫，属土，脾属土，故养脾；《阳春白雪》五音为商，属金，肺属金，故养肺……以此观之，中医不仅治“病”，更是治人。古人不曰“治病”而曰养：养病者，休养生息、纠其偏向，调和阴阳之谓也。

哲学家楼宇烈认为，“中医的哲学理念就是在实践中国文化，实践中国哲学，实践中国的道，离开了这些内容，就不能叫中国哲学，不能叫做国医”。前些年，学界曾有“中医是否科学”之论辩。其实，若以现代科学的标准看，中医确实算不上“科学”，因为无论从逻辑推演、量化标准还是治疗方案来看，其与现代意义上的“量化科学”相距甚远；西医面对的仅是可量化的肉体，西医就在此客观对象上发挥功能。中医面对的是人之整体系统，包括身体与精神，它考虑的不仅是肉体本身，还要考虑人的情志、心理、精神等因素，它完全是有机整体思维模式。依此看，中医似更倾向于文化医、人文医。哲学家牟宗三先生对中医有一个有趣的看法，他认为，“中医境界层次比西医高，难就难在你看得准不准”。

但是笔者无意于为中医、西医争长短，二者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，皆从不同维度治病救人。本文所论，旨在表明：中医之名，要核在“中”，所谓“中和、中道、中庸”是也。就此维度而言，中医不仅仅是一种医疗手段，更是一套系统哲学，一套以“中和”之道来应对万物乃至与世界相处的生存方式。

